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9月8日

专家视点

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贾高建

努力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必须充分重视。而要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弄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应该看到，这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和不正确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梳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

对于许多干部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以往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学习过或接触过。但要认真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却往往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是“玄学”，离现实比较远，与实际工作关系不大；有人认为哲学是一种“闲学”，可学可不学，属于“无用”之学；还有人把哲学看作某种说教类的东西，以为它是一些空洞理念或信条的汇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呢？

这里应注意两个基本要点。第一，要了解哲学这一学科自身存在的历史差异。应该说，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同时也是内部差异最大的学科之一。从古到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哲学，而各种哲学在性质上往往有很大差别。从学科定位看，各种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很不相同，对哲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理解各异；从体系内容看，各种不同的流派和思潮异彩纷呈，相互之间常常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对立。所以，不宜简单地一概而论，用某一种特殊的规定去套所有的哲学。但是第二，应该明确，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哲学，并不是所有这些不同的哲学，而是其中的一种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在这么多的哲学中，我们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哲学？这就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性质和功能。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哲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整个哲学史上的积极成果，克服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局限，创立了自己的新的哲学。而正是这个新的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根本变革，成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使得哲学的学科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解决了哲学的定位问题，以及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哲学定位上的模糊和混乱日益凸显，以至于哲学家们试图将当时已经广泛兴起的各门具体科学的内容也纳入哲学体系中，使哲学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了这种哲学的“终结”，指出由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这样的旧哲学已不再需要；他们把自己的新的哲学定位在世界观的高度，研究世界的本质和最一般规律，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把各个领域中特殊规律的研究交给各门具体科学，实现了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合理分离。

其次，正是在这个世界观的高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重大成就：它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科学统一；它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亦即唯物史观；它立足于社会实践，科学地解决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新就新在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亦即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样一种新的哲学，不再像其他一些哲学那样是凭着哲学家本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构建的非科学的体系，更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空洞说教，而是一种以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真正科学的学说体系。

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新的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远离现实的书斋学问，而是直接面对现实实践，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要创立这一哲学，就是为了借助它的科学方法论，深入研究和探索他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并指导其他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都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如今，我们正在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要在新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导。因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可学可不学的无关紧要的学问，而是必须下气力学习和掌握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适合于当代实践

在这里，往往又会遇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产生于十九世纪，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它还能不能适合今天的新的实践和新的要求？是不是有些“过时”了？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仍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说起。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内容所包含的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和反映。那么，判断这一学说是否“过时”，就要看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否继续存在，它对这些规律的揭示是否继续有效。而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并非某些特殊条件下的特殊规律，而是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中最一般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存在，并不会因为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发生改变。历史实践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其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觉遵循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而背离这些规律，就必然会遭到挫折和失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不过时，它在当代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没有改变，对此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它作为人类认识的具体成果，只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因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按照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每一代人都是在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这就需要后人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将认识不断向前推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也同样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已有成果是经典作家在当年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做出新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认识成果，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的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断做出新的阐发。在中国，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还应指出，我国哲学理论界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学理支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应该继续坚持，同时又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坚持和发展应该统一起来，而不能片面地割裂开来，更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各种绝对化、极端化的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新时期论坛

中国梦的人文关怀

□张耿怀

中国梦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正能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空间，确立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导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理论。

人民性。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阐述，充分体现了中国梦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秉承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与马克思主义追求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文关怀精神一脉相承，也表明了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一根本属性。

实践性。中国梦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幸福关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唯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仅仅只给予意识形态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同情，而不去实施有力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即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中国梦不同于唯心主义人文关怀的虚无博爱，而是扎根于唯物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发展强国规划、发展福民规划及其实施、落实中。即其实现途径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先进文化，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到建党100周年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走计划胜利实现之后的又一个量化的宏伟发展目标，老百姓将来要用“两个一百年”衡量执政成果。中国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的“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观点相统一。同时，发展战略目标又以定性发展到定量，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更加可感知、可确信、靠得住、可实现，也体现了我党治国理政水平的新跨越，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民族性。悲壮曲折的近现代史和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华儿女深深明白：“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追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中华英烈的最好缅怀与告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准确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从苦难中重塑辉煌的强烈愿望，也是在人民利益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使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维护，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互相协调，凝聚起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最大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因此，中国梦的人文关怀根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既有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思想，更具有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浓烈的中华家国一体、图强复兴的人文情愫。

时代性。和平发展是中国梦人文关怀的时代性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人文关怀论断的时代化发展。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现实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他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大国情怀。打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侵略魔咒，带给世界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兼容性。中国梦主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世界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是相通的。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和而不同”的文化关怀，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论断，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良性互动的指引，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敬重。

系统性。中国梦的人文关怀具有系统性的显著特征。一是发展目标的系统性。中国梦把国家的、民族的、个人的梦有机统一起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人民幸福包含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中，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二是发展手段的系统性。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和深化国防军队改革。“五位一体”的发展观，体现了中国梦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摆脱了单纯唯经济的发展模式，统筹考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协调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形象性。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深化改革、“两个一百年”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战略问题，高度浓缩为中国梦，并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样，中国梦既生动形象，又浅显易懂。老百姓听得懂、感受深、用得上。使党的先进理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老百姓所熟知、所掌握、所应用，起到了很好的快速动员和快速转化的理论效用。从艰难晦涩的象牙塔理论，到形象精准的百姓口语，是符合时代的理论创新，中国梦的大众化、平民化，既表现了执政高层具有很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又充分体现了执政高层具有深厚的平民情怀——以百姓的喜闻乐见为理论依归。

理论研究

渐进性改革中的部分性突进

□李海青

按照一般理解，中国的改革属于渐进性改革，不仅在改革内容上并非推倒重来，而且在改革步骤上也是稳步推进。但是，改革的渐进性只是就全局与整体进程而言，其并不排除一定条件下在某些领域、环节或阶段出台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整体渐进中不排除部分突进。在保持整体渐进性的前提下，适时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强力推进改革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那么，在什么形势与条件下，这种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的突进性改革才有可能与必要呢？

条件之一是在改革推进中碰到某些难啃的硬骨头时。中国的改革总体而言遵循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外围到核心、由增量到存量的改革策略。随着改革的推进，整体改革的难度会逐渐增大，当然，各具体领域的改革进程亦是如此。当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好改易改的方面差不多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大都是涉及复杂关系、触及深层利益、指向深层结构、阻力障碍空前的关键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问题解决难度大但又较为紧迫、不容回避，比如当前改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腐败治理问题、权力制衡问题、利益矛盾的整合问题、公民的利益表达与维护问题等等，均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攻坚克难的形势，不温不火、四平八稳的常规性改革措施往往难以奏效，突进性改革也就成为必须。只有有针对性地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采取强有力的、带有突破性的措施，才能在量的积累基础之上，有效推动改革实现由量变到部分质变的跨越，积多年之功切实推动改革深化与破旧立新。如其不然，多年的改革量变很难借机、借势突破量的幅度节点实现部分质变。不论就整体改革而言，还是就某一改革领域而言，都是如此。在此意义上，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化，有力度的、突进性的改革举措相较于以往，出台恐怕会更为频繁。当然，与此对应，基于利益的改革博弈与争论也会进一步凸显。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

条件之二是在改革进程中，相关支持因素不断增强，使得突进性改革能够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改革的切实深化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持，如果缺乏相应的支持条件，碰到硬骨头，明知躲不开、绕不过，改革也无法推进。纵观中国改革历程，民众对经济权利与自由的执着追求，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对国家基本制度架构与中央高层的认同；社会成员利益意识与权利观念的不断启蒙，现代文明素质的不断增强，公民身份的逐步凸显；中国对于全球化进程更深更广的融入所导致的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变迁以及对以上诸领域进一步的变革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领域在维护公民权利、推进社会自治、批判公权滥政等方面功能发挥得日益明显；大众传媒特别是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体在表达公民利益诉求、捍卫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监督制约公共权力、推进生态建设等方面作用发挥得愈益重要，等等。这些都是改革深化的有力支持因素，改革深化的动力所在。实际上，改革越推进，难题固然会愈益凸显，难度固然会不断增大，但长期改革也会积聚巨大的改革势能，形成巨大的改革惯性，强化已有的改革思维。就此而言，中国改革一直以来并不缺乏动力支持。当然，仅仅具备以上动力因素也未必会导致改革形成大的突破，以上动力因素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还要取决于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对之如何整合利用。换言之，即使以上动力因素都已具备，但是如果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缺乏有效的改革权威、足够的改革勇气、明晰的改革思路、改革也往往无法获得实质性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改革动力就会受到抑制，逐步弱化，更谈不上形成合力。这说明，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是最为关键的动力因素。只要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具有足够的改革权威，能够充分考虑到改革的支持条件，善于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各方面的改革支持因素就会得到较为有效的整合利用，改革的动力因素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与共振效应，共同汇聚成推动改革的合力与正能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难题与阻力，突进性改革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

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说明，在改革进程中，当难题与硬骨头凸显而改革又具有足够的动力支持时，突进性改革的条件就具备了。以上分析也说明，在特定的改革形势下，当改革深化的阻力与动力并存时，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的作用至关重要。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就曾专门强调过改革进程中主导者与决策者所应具有的勇气和胆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新阶段，习近平也强调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审视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形势可以发现，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攻坚中的各种难题与挑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充分利用各种改革有利因素与支持条件，把握时机积极出台各项有力度的改革举措，中国改革呈现出新的气象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外的改革动力相互支持，原本存在的改革动力不仅得到保持，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增强，在某些领域与环节实行突进性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未来几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阶段，是真正的硬碰硬的利益博弈阶段，面对待改革的旧体制、旧机制、旧结构，面对体制内外的强大改革阻力，只要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牢牢树立改革权威、明确改革思路，锐意进取、敢于突破，就可以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激情、凝聚起最为强劲的改革动力。回顾改革历程，也正是在这种把握时机的突进性改革中，中国的改革得以实现一次次的突破，从而展现出不可逆的深化趋势。